

詮釋「知」、「行」關係的政治涵義： 孫文與蔣中正的比較

黃自進*

1918年孫文發表「知難行易」論，主旨在於宣揚三民主義在中國的落實，然其前提為，民眾要懂得遵從先知，服從領導，積極推展中國國民黨為中國所設計之建國藍圖。蓋此一論述與孫文擱置「議會政治」改革，轉而主張「直接民權」，並強調「訓政」體制以及推展「以黨領政」有互為表裏的因果關係。

至於蔣中正於1932年決更易「知難行易」論，另闢蹊徑，採陽明學中的「知行合一」，則無非是認為先知已逝，處新的黨國體制下，亟需新的心理建設之論述。對他而言，與其強調信仰先知，不如強調忠實履行組織命令；強調信仰個人，亦不如強調服從黨國體制。

孫、蔣兩人對「知」與「行」的認知不一，與兩人對陽明學的評價不一，和兩人的日本近代史觀亦有所關連。對孫而言，日本現代化之有成，首重在於他們全面西化政策，其次得力於長年武家政治之薰陶，武士勇於接受挑戰，富冒險犯難精神。因此，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聯絡地址：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No.128, Sec. 2, Academia Rd., Nank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9, Taiwan [R.O.C.])。

孫反對明治維新之成功有賴於陽明學的說法。反之，蔣中正卻推崇日本於德川幕府時代，能夠吸取陽明學的「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精神，故勇於接受新思想以外，並樂於實踐。此即明治時代決定改革開放之後，日本就能立即西化，進而改革有成之緣由。

關鍵詞：孫文、蔣中正、陽明學、知難行易、知行合一

一、前言

中國國民黨黨章中，特列有「總理」、「總裁」兩專章，分別規定「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文先生為總理」及「本黨以繼承總理領導革命之蔣中正先生為總裁」。這兩章的文字，出於孫、蔣逝世之際國民黨大會決予保留「總理」及「總裁」兩項職位，分別作為兩人於黨內所獨有之榮銜。此等榮銜，不僅彰顯兩人在國民黨內的特殊地位，也表露孫文、蔣中正兩人在國民黨內的傳承關係。

基於孫文、蔣中正兩人在國民黨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本文將就革命史角度來檢視兩人如何致力於對國人的心理建設。特別是，兩位領導人為有效動員民眾，曾分別提出「知難行易」以及「知行合一」的兩種不同論述。倘若能深入探討其中所反映不同思維方式，應有助於吾人對兩位領導人領導風格差異，及爾後國民黨於文化政策上演變，能有更深入理解。所謂知行問題本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命題，尤其是在中國傳統士人社群，「求知」與「為聖」是一脈相連，求知等同於道德修鍊。¹孫文、蔣中正兩人的思維，自亦受到前揭傳統的影響或牽動。

可是，既有的研究多將孫文、蔣中正兩人的「知行觀」視為哲學領域，主要從兩人的內在思路的脈絡中著手，²較為忽視兩人身為政治人物的原本角色。其實，對政治人物而言，首重在於能回應時代的需求，其所有的相關論述，皆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衍生。研究者唯有將兩人的論述，置於當時的時空背景中探索，才更能掌握他們的論述中所蘊含的時代意義。

¹ 方克立，〈重印前言〉，《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4。

² 可列入代表者有：方克立，《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賀麟，《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重慶：青年書店，1943）；胡適，〈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吳淞月刊》，第2卷第4號（上海，1927.06），頁1-10；秦英君，〈蔣介石「力行哲學」思想論〉，《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開封，1990.08），頁16-22；黃道炫，〈蔣介石與朱、王二學〉，《史學月刊》，2012年第12期（開封，2012.12），頁37-42；黃克武，〈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國史館館刊》，第34期（臺北，2012.12），頁45-68。

綜上思考，本文首先從孫文的思想轉折脈絡中，探索渠於 1918 年撰寫「知難行易」時的所見所思以及所行。復次，再從孫文、蔣中正兩人在黨內扮演不同角色的角度，探索蔣於 1932 年為何捨「知難行易」說，改提「知行合一」論的前因後果。最後，再以兩人對陽明學評價不一以及日本生活體驗的不一為線索，解析兩人在「知行」論上的異同。

二、「知難行易」論的理論建構

(一)「知難行易」論與孫文革命理論的重建

「知難行易」論，是《孫文學說》的核心論述。這本書可視為，孫文總結個人長年從事中國革命經驗，敦勉國人要勇於篤實力行的勵志專著。

孫文看重本書之處，可從以下兩個具體事例，提供見證。首先，本書是孫文平生少數親自撰寫的文稿之一。³復次，孫文將本書與《民權初步》及《實業計畫》等前後期出版的兩本書，合稱《建國方略》，⁴自詡為其籌畫國家建設的主要藍圖。

按孫文的解析，其「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⁵而上揭三本書，之所以能被評為《建國方略》，乃是因孫文學說主旨在闡明知難行易學說，稱為心理建設；實業計畫為經濟建設之重大方針與基本藍圖，稱為物質建設；民權初步在教導國民行使民權，發揚民治精神，建立社會規範，稱社會建設。

「知難行易」論既然被定位為《建國方略》中心理建設的主要思想內涵，若欲掌握該理論的精髓，除了追究孫文倡導該論述的來龍去脈以外，自然

³ 按胡漢民的敘述，本書是孫文親自撰寫，於3個月時間內一氣呵成。胡漢民，〈孫文學說的寫稿經過與其內容〉，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編，《胡漢民先生文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第2冊，頁449。

⁴ 孫文，〈自序〉，《三民主義》，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第1冊，頁1。

⁵ 孫文，〈論著·中國革命史〉，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頁357。

亦得深入探究該論述與《建國方略》其他論述之間互動關係，以及《建國方略》在孫文的建國大計中所扮演的角色。

《建國方略》中的三部專作，按其發表順序，分別為《民權初步》(1917)，《孫文學說》(1918)及《實業計畫》(1921)。孫文將此三本專著，合而為一，用心無非是三本著作所反映的思想結晶，可視為他的革命理論建構過程中的一個新里程碑，當中有不少他的新體會及論述。

例如，在《民權初步》中，他將其心目中的民國，定位為「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並主張他所要的民權為「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制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⁶

至於在《孫文學說》中，他又重新強調為推展革命建國，需循序經歷三個階段，分別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及「憲政時期」。革命興起，第一階段為破壞期，擬在此時期內實行軍法，以革命軍擔任打破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等。第二期為過渡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建設地方自治，以地方可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為標的。俟全國各縣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第三期為建設完成時期，擬在此時期始，施行憲法，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行之。⁷

孫文認為，革命建國需經歷破壞、過渡，以及建設的三階段。三階段之說，是自孫文成立同盟會以來，1906年頒布〈革命方略〉時，就有的主張。同盟會時期的用語是「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及「憲法之治」。⁸到了1914年7月，頒布中華革命黨總章之時，則將此一「三治」說改為「軍政」、「訓政」及「憲政」之三「政」說。此間的差異，除了用語不同，尚

⁶ 孫文，〈序〉，《民權初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頁1。

⁷ 孫文，〈行易知難·第六章·能知必能行〉，《孫文學說》，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頁388。

⁸ 孫文，〈軍政府宣言〉，《革命方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頁234。

有時限及主政機構之別。⁹例如，同盟會時期針對「軍法」及「約法」之治，皆有3年及6年期效之規定。¹⁰而到中華革命黨時期則無。¹¹復次，同盟會時期，對上揭兩個時期的主政機構則明訂為軍政府；¹²然到中華革命黨時期，則改由革命黨負責。¹³

及至中國國民黨時期，孫文開始援用1918年所發表的《孫文學說》，而在其重新撰寫的〈革命方略〉中，除保留了「三政」時期的用語，又恢復了「軍政」3年、「訓政」6年的期限規定。¹⁴這些變化，自然皆是理解孫文革命史觀演變過程中的重要線索，尤其是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有密切的因果關係。其中關連，此處暫置不表，待下段再詳加探究。

孫文撰《實業計畫》書稿，原本冀望能促成利用歐美各國早前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遺留下來的眾多機器設備，以及戰時動員體制下保有的豐沛人力資源能夠轉投資到中國。孫認為，此舉不僅可有效開發中國資源，進而也可解決各國所面臨到因生產過剩所帶來的經濟恐慌危機。¹⁵

《實業計畫》初稿，是用英文撰寫，標題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正文分六大計畫，係將全國分為六大區域，每區域為一設計單位，即一計畫，係依據各區域之自然環境，資源分配及國防需要而作之精細設計。建設項目則分十項，細目涵蓋建築鐵路、開通運河、開闢商港、發展水力等。¹⁶

《實業計畫》作為展現孫文對實業開發中國資源的藍圖，其中卻有一段談及對未來沿海民眾可往西北墾殖之期許。孫認為，若能在蒙古、新疆及甘肅一帶面積約170萬英方里的西北大地上，敷設7千英里之鐵路，不僅

⁹ 陳儀深，《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227-228。

¹⁰ 孫文，〈軍政府宣言〉，頁234。

¹¹ 孫文，〈規章·中華革命黨總章〉，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9冊，頁300-301。

¹² 孫文，〈軍政府宣言〉，頁234。

¹³ 孫文，〈規章·中華革命黨總章〉，頁301。

¹⁴ 孫文，〈知難行易·第六章·能知必能行〉，頁387-388。

¹⁵ 孫文，〈序〉，《實業計畫》，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頁423。

¹⁶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第2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290-291。

可將此區域建設成未來北方大港¹⁷之腹地，「而復可以將中國東南部過密之人民，逐漸遷移」。易言之，孫文的開發大西北計畫中，鼓勵沿海民眾前往移居，亦是重要一環。¹⁸

針對前揭論述，研究者若能參照孫文同時期對民族主義的新詮釋，益能掌握他於此時期思想上轉折所蘊含的時代意義。例如，1921年3月，孫文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時，就提到：

自光復以來，就有世襲官僚，頑固底舊黨，復辟底宗社黨，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豈知根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講到五族底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人不到百萬，滿人只數百萬，回教雖眾，大都漢人。講到他們底形勢，滿洲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範圍，西藏亦幾成英國底囊中物，足見他們皆無自衛底能力，我們漢族應幫助他才是，……由此可知，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民族主義國家。¹⁹

按孫文於1912年元旦所發表的「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宣言」，當時他的論述是「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民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²⁰易言之，民國成立，孫文初掌政權時，他所倡導的「民族」主義政策是「五族共和」。及至1921年時，他開始否定此一論述，套用他的話，認為今後中國應致力的方向，應是「特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²¹

綜合以上《建國方略》三部專著中所反映的新思維，可知此一時期孫文的革命理論已有所調整。首先，他開始引進直接民權的概念，主張以縣為自治單位，讓民眾享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等四項權利。其次，

¹⁷ 按實業計畫，此一大港擬在直隸灣中，青河、灤河兩口之間，沿大沽口、秦皇島間海岸岬角上建造。孫文，《實業計畫》，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頁431。

¹⁸ 孫文，《實業計畫》，頁509。

¹⁹ 孫文，〈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1921年3月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3冊，頁227。

²⁰ 孫文，〈宣言及文告·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1921年1月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頁23-24。

²¹ 孫文，〈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頁228。

他恢復對「軍政」、「訓政」應各有3年及6年時效的規定。最後，則是他放棄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的「五族共和」之論述，重新高舉反清革命時期的「恢復中華」主張，追求以漢族為中心同化其他少數民族。這亦是他在《實業計畫》中，倡導漢民族要積極移民實邊西北內地的緣由。²²

孫文針對自己政治論述所作的一連串調整，目的無非是為了因應中國的新情勢，以及黨的再改造。特別是，1918年5月，他因受非常國會政學系議員與西南地方軍閥排擠，被逼辭廣州軍政府大元帥職。²³孫當此缺乏政治光環之際，冀望推動國人之思想革命，自然就成為他再出發的新布局。

(二)「知難行易」論所蘊含的政治意圖

1918年6月至1920年12月，是孫文被逼暫離政壇，移居上海潛心著述、以啟民智的時期。除上述的《孫文學說》和《實業計畫》兩本著作以外，〈三民主義手稿本〉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的兩篇專文亦是此一時期的作品。²⁴至於1919年10月10日，孫文在上海決定將中華革命黨改組中國國民黨，適時反映他已決定將論述文字轉化為具體的革命行動，並期待由黨的再造，為中國革命找到再起之新契機。

有鑑於孫文在此一時期的論述，與革命黨的改組，有互為表裡的因果關係，特別是擔負「心理建設」重責的《孫文學說》，更是黨改造的核心論述，吾人探索《孫文學說》時，自不得不從其中所蘊含的政治意圖中著手。

對於為何要撰寫《孫文學說》，孫文在該書的自序中提及，他認為中國革命之未成，癥結出在黨內核心之腐化，皆罹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迷思之故，故他強調，「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人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

²² 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国父になった大ぼら吹き》（東京：岩波書店，2014），頁183-190。

²³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下冊，頁537。

²⁴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286、308。

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²⁵

為打破國人之畏難之心，尤其是黨內同仁雖皆肯定他革命理念之恢宏壯闊，然受制於生活慣性及時勢，而怯陣實踐，孫文特別於《孫文學說》中列舉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氣、化學、進化10事為例，說明知難行易之理。

以10例實證「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的學理之後，他又舉人類進化以及人之稟賦等事例，為其「知難行易」解惑。他指陳「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至於人之稟賦，也可分為三種類：「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為後知後覺者，為倣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²⁶

針對「知難行易」與人類文明進化三階段，以及人的稟賦三種類等論述之間的三角關係，胡適則有相當精闢的解析。按胡適所言：

凡物類與人類，為需要所逼迫，都會創造發明。鳥能築巢，又能高飛。這都是不知而能行的明證。我們的老祖宗製造豆腐，製造瓷器，建築長城，開闢運河，都是不知而行的明證。西洋人行的越多，知的也越多；知多了，行的也更多。他們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我們却受了暮氣的毒，事事畏難，越不行，越不知，越不知，便越不行。救濟之法，只有一條路，就是力行。但力行却也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要服從領袖，要服從先知先覺者的信仰，……「行易知難」的真意義只是要我們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的責任。大多數的人應該崇拜知識學問，服從領袖，奉行計畫。那中級的後知後覺者也只應該服從先覺的理想計畫，替他鼓吹宣傳，使多數人明白他的理想，使那種理想容易實行。……²⁷

易言之，按胡適之解釋，「中山先生著書的本意只是要說：『服從我，奉行

²⁵ 孫文，〈自序〉，《孫文學說》，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頁351。

²⁶ 孫文，〈行易知難·第五章·知行總論〉，《孫文學說》，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頁384-385。

²⁷ 胡適，〈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頁6。

我的建國方略』。²⁸將《孫文學說》定位為要求中國民眾無條件支持中國國民黨革命事業的此種論述，對當時並不算特例；鈴江言一於 1931 年撰寫的《孫文傳》，就以《孫文學說》為例，認為孫文的「民主主義」是一部將指導者與被指導者嚴格區分為兩個不同階級的論述，是一部承認先知先覺有獨裁權利，而否定後知後覺者也擁有自由判斷權利的表述。²⁹至於新近橫山宏章出版的《真實面貌的孫文》，則將孫文在《孫文學說》中所倡導的「知難行易」論，視為是他長年對中國民眾無知的一種反制；換言之，孫以為唯有樹立他對「知」詮釋權的獨佔地位，³⁰如此才能突破中國革命之困境。

「知難行易」論是否可無限上綱的解讀為孫文「獨裁」論的起源，當是屬於見仁見智的範疇。惟研究者一旦參照孫文同時期的其他論述，例如重拾「軍政 3 年，訓政 6 年」的革命進程論，以及引進直接民權、倡導地方自治、主張民族同化等說法，就可發覺孫文在創建中國國民黨的同時，對革命策略與理論上已作了如下的調整。

首先，孫文更加肯定革命需要三個階段的循序發展。孫相信，中國革命的悲劇，乃是出於革命同志不相信他的見解，在辛亥革命爆發一舉推翻帝制後，就越過了訓政時期，隨即召開國會。是故，孫在改組革命黨重新出發後，堅持擱置議會政治，重提訓政的政治信念。基此思考，孫口中的「全民政治」，是靠民眾在地方實施直接民權而達成；而民眾是否能具體運用「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權，來充分展現民眾對政府「治權」的控制，以及，十足擁有民眾原本應享有的「政權」權益，端視國民黨能否善盡職守，訓練人民個個皆能善用四權，成功扮演民國主人翁而定。

在孫文的憲政建國藍圖中，當下「全民政治」的成功與否，得仰仗國民黨的「訓政」成功與否而定奪。至於所謂兩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為前提的「政黨政治」，自然不置於追求標的。「以黨領政」，尤其是讓「國民黨」更能扮演好執政裸母的角色，才是孫文時有所思的新目標。

眾所周知，1924 年國民黨採「聯俄容共」政策，隨後組建黨軍，籌建

²⁸ 胡適，〈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頁 7。

²⁹ 鈴江言一，〈孫文傳〉（東京：岩波書店，1967），頁 379-381。

³⁰ 橫山宏章，〈素顔の孫文：国父になった大ぼら吹き〉，頁 182-183。

「以黨建國」體制以及在黨內推展「民主集中制」等作為，是國民黨革命路線、組織形態的重大變革。³¹這些變動，不僅讓國民黨能及時蛻變，成為擁有武裝以及高度組織動員能力的政黨，也奠定了爾後北伐成功、一躍成為執政黨的重要基礎。然而，這些讓國民黨脫胎換骨的全盤變革之所以能順利推展，孫文在《建國方略》時期所呈現的新思維，實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也就是說，正因為孫文在下筆《建國方略》之時，擱置了「議會政治」，改採「以黨領政」論述，³²國民黨才開始具備能與「以黨建國」、「民主集中制」等蘇聯模式相容的空間。至於「知難行易」學說中所倡導的「服從先知、服從領導」的模式，為孫文所樹立的領導權威，更確保了孫在黨內擁有無人可及的權力，得以於「聯俄容共」時期大刀闊斧推展改革。

三、「知行合一」論的政治訴求

(一)新生活運動的緣起

相較於孫文在中國國民黨中所扮演的理論家角色，蔣中正可謂是一位將孫文的革命理論轉化成具體政策，並求能有效執行之實踐家。蔣中正雖未曾系統提出革命理論，然為鞏固國民黨政權，及有效抵抗頑敵，猶須不斷嘗試推行各種思想改造運動。其中，作為大陸時期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所發起的「新生活運動」，³³其宗旨不外乎以南昌作為據點，藉由改革國民生活運動，來締造民族復興之新契機。至於選擇南昌理由，則是因蔣中正為籌備第五次圍剿中共的軍事行動，於1933年5月21日，奉國民政府之命，特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³⁴後，其

³¹ 張朋園，《從民權到權威：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47、56。

³² 張朋園，《從民權到權威：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20-25。

³³ 劉維開，〈國民政府的備戰〉，收入許瑞浩、蕭李居編，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和戰抉擇》（臺北：國史館，2015），頁279。

³⁴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2014）第4冊，頁94-95。

政治生涯之重心早已轉移南昌。對蔣來說，惟有在南昌才可收親自主持、事必躬親，並達到劍及履及的效果。

按黃道炫、陳鐵健之研究，³⁵蔣中正欲推動新生活運動，最早可追溯至1932年7月17日，思考點是認為傳統整合中國社會之工具，皆已無法有效運作。例如，在蔣氏《事略稿本》中，曾有如下的記載：

下午蕭一山來見公，曰中國治道，向以黃老與名刑並用，而折中於孔子中庸之教，然孔子之教，兼帶乎禮，又不能成為純粹宗教。治國工具，以宗教、禮教、法律三者並用，今中國宗教完全失效，而法律亦自曹魏而敗壞，趙宋以來，孔教又為佛教所敗，宋儒且偏重於佛學，演至今日，孔教破產，所以思想複雜、法度不立，禮教失效云云。公謂：「蕭君所見在於法度與思想之大處是可佩也」。³⁶

蕭一山的談話，之所以能引起蔣中正的共鳴，固然是出於最能切中時弊，也是基於能一解蔣的心中疑惑。尤其是，此次談話不及2個月後，蔣中正於9月16日的日記中，就湧現他對此一議題之回應，顯示所受啟發之大。

近日甚思提倡復興運動與民族德性，而以勞力為主，以禮義廉恥為體，以堅苦耐勞為用，以樹立紀律、整齊秩序為目標。嗚呼，欲救中國，如不從救人心入手，則緣木而求魚也。欲救人心，如不從注重德性入手，則南轅而北轍也……。³⁷

發動一拯救人心之社會運動，以期恢復禮教於傳統中國社會所扮演之功能，乃蔣中正針對當前社會暮氣沉沉，所力圖為中華民族再創生機所策畫之新方案。蔣的基本認知是，如欲拯救人心，惟有從德性入手。這種看法，顯示他對中國傳統固有道德的肯定。可是，蔣又指陳要以「堅苦耐勞為用」，以「樹立紀律，整齊秩序為目標」，更顯示了此一活動是一內求培養德性，外求整齊劃一，心靈與外表皆需兼顧之身心改造運動。

³⁵ 黃道炫、陳鐵健，《蔣中正：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頁217-218。

³⁶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4），第15卷：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至七月，頁527-528。

³⁷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4），第16卷：民國二十一年八月至九月，頁428-429。

對於此一身心改造運動，為何內外皆要兼顧，究其原委，可從蔣中正的政治意圖以及他的文化史觀之間，於縱橫交錯的因素中，尋覓線索。以政治意圖及其牽涉的政治現勢言，北伐告成以後，蔣中正一躍成為國民黨中樞，但同時又得因應北伐時期所製造的兩個強敵——中共與日本，長期困擾不已。為了要有效對抗中共及日本，他需要打造一個能將國民的日常生活規範導向與戰時生活體制接軌的戰鬥社會。尤其是自 1930 年 10 月起，國民政府已投入剿共作戰四次，皆未達成具體成效。剿共作戰之一再失利，在在證實中共確實是心腹之患，亦證實這是一支有組織、有信仰的革命武力，不能與傳統軍閥畫上等號。於是，蔣總結歷次剿共失敗後，體會出新的制敵方針「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亦即，要應付中共，不獨需要調度有形的軍事武力，社會精神層面的動員更是不可忽略的要素。

不過，蔣中正作為國家領導中樞，不似在野時代的孫文，還需先以著書立說來爭取國人對他領導地位的認同。蔣所需要的，反而是如何鞏固既有的價值體系。易言之，當黨國體制已趨成形，體制內已無人敢挑戰國民黨，而信仰國民黨已被要求為國民基本素養時，如何將信仰化成具體行動，如何有效動員民眾願為黨國獻身，才是作為執政者的蔣中正，所急需面對的挑戰。

對於如何將既有的信仰轉化成具體行動，蔣中正依賴其個人兩種不同層次的人生體驗。首先，是其成長過程中，仿效宋明道學，企圖自我實踐「存天理，去人欲」的修身過程；³⁸其次，則是在日本接受的軍事教育，所經歷過的紀律掌控心智的軍旅生涯。按蔣中正為新生活運動吹起啟動號角時內部之談話，首先他認為人與時間、空間之間的三角互動，為創造人世間諸般現象之原始動力。所謂文化，即是「人類發揮其智能，以把握時間空間，支配諸般事務，而不斷的改善其生活之繼續努力的歷程與日積月累

³⁸ 按楊天石的研究，蔣中正於36歲到40歲之間，亦就是1919年到26年間，他曾按宋明道學所倡導的倫理規範，特別在「戒色」、「戒忿」、「戒客氣」、「戒名利」等議題上的勵志修身。楊天石，〈宋明道學與蔣介石早年的個人修養：讀蔣介石未刊日記〉，收入楊天石著，張曉敏、施宣圓編，《楊天石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第2冊，頁284-302。

的產果也。」³⁹

蓋此匯集人群不斷謀求改善生活之成果，即是吾輩所稱文化。而此種某一特定空間與人群之文化特質，藉由彼等日常生活之展現。用蔣中正的術語來說，「故文化者，生活之神髓也。生活者，文化之實體也」。⁴⁰

日常生活既然可作為觀測生活神髓的指標，改進日常生活方式自然成為提升文化素質的不二法門。此亦是蔣中正將新生活運動定位為「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的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緣由。⁴¹可以說，將此一原本隸屬於個人修身養性之私人領域，擴大為全國國民為對象之公眾議題的思維，顯係來自於蔣中正的革命史觀。

如按蔣中正之解釋，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生活型態之謂」。故對他而言，「革命即生活型態之改進也」。基於此一革命史觀，他亦將新生活運動視為全國國民基本生活獲取澈底改造之社會教育運動。認為「此種運動果能普遍收效，使全國國民之基本實際生活能澈底改進成功，則全民之精神必為之煥然一新，而社會國家之進步不可計量，革命之基本工作於以成功，民族復興之機運可立而待也。」⁴²

新生活運動所蘊含的政治意涵，除了可從上述的內部談話來尋索，更可從以下事例得到佐證。7月1日，蔣中正特地在南昌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本人親自兼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主任幹事，鄧文儀為副主任幹事，全國25省、4院轄市、1,355個縣皆設有分會。⁴³此一運動，爾後為因應南昌行營的結束，於1935年11月遷至南京，並於戰時繼續推行，至1947年始結束。⁴⁴抗戰期間，該運動促進會全面致力於戰地服

³⁹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發凡〉(1934年2月1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第12卷：演講，頁69。

⁴⁰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發凡〉，頁69。

⁴¹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發凡〉，頁69。

⁴²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發凡〉，頁69。

⁴³ 劉維開，〈國民政府的備戰〉，頁284-285。

⁴⁴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第3編：訓政建設與安內攘外，頁238-239。

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童嬰保育、金錢捐助、物品徵募等，力求鼓舞民心士氣，發揮精神動員的作用。⁴⁵

蔣中正倡導新生活運動，謀求國運之再興，不獨是針對眼前剿匪的需要，尤其著意為即將爆發的中日戰爭預作準備。⁴⁶蓋該運動既是對日備戰工程之一環，掌握敵情，敵我意識之分析，自然也是理解蔣中正推展新生活運動原意之重要線索。

就蔣中正的認知，日本之強盛，得利於工業化以及吸取中國王陽明的實踐哲學；後兩者因素，皆是今日中國社會最欠缺者。1934年3月2日在南昌一場〈留學生之責任與基本修養〉演講時，蔣中正舉了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到德國考察的事蹟為例，來說明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不如日本之緣由。他說：

伊藤博文注重考察他們社會的組織，教育的方針，和政治、經濟各種制度和政策，以及陸海軍的編制，訓練，工廠的管理等等；而李鴻章卻專門注重軍械的製造，工廠的設備，軍備的情形，到克虜伯砲廠來研究槍砲的來復線。⁴⁷

換言之，在蔣中正看來，伊藤博文和李鴻章對西方文明本質認知不一，對引進西方文明角度也有差異。蔣認為，李鴻章的西方認識侷限於「船堅砲利」，因而只對具有實用性質的科技文明表達興致，使得他的西方取經成效僅在於創辦「招商局」和「上海兵工廠」。⁴⁸相較於此，伊藤博文注重研究西方之建國精神，以及科技發展與制度管理運作之間的互動關係。綜上可知，伊藤博文掌握了西方文明發展之真諦，日本對西方文化的引進是一個從點到線的全方位推動過程，而摹仿學習的層面也是從制度、教育、學術等各個領域上著手。

伊藤博文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奧妙所在，遂願全面地學習西方文明，進行日本社會之徹底改造。然而「認知」並不同於「實踐」，中國的古諺「知

⁴⁵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2009，2版)，頁333。

⁴⁶ 劉維開，〈國民政府的備戰〉，頁280-292。

⁴⁷ 蔣中正，〈留學生之責任與基本修養〉(1934年3月2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頁83。

⁴⁸ 蔣中正，〈留學生之責任與基本修養〉，頁83。

難行易」，即是典型實例。就蔣中正來看，日本之可貴，在於上位者能啟風氣之先，適時掌握學習西方之必要，而一般國民也培養重實踐之生活習慣，故能「上行下效」，在短短幾十年內奠定日本工業化基礎。

綜上所述，對蔣中正而言，工業化並不困難，關鍵在於是否具備「學習」與「落實」工業化熱忱，也就是他所強調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精神。尤其他對陽明學的高度評價，更可從以下講詞中，獲得明證：

日本人之所以能立國，而且能到今天這樣強橫的地位，竟然做了世界上五強之一，從前已是割我們的臺灣、琉球、朝鮮，今天且來侵略我們東三省，和侵略我們上海，不是別的，完全是拿我們中國的東西，來打擊我們中國。他拿了我們什麼東西呢？他除了新發明的潛水艇，飛機，新的科學，是從歐美學來之外，其他所有的東西，統統是學我們中國的。尤其是學我們中國的精神哲學就是竊取王陽明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之唾餘。日本自從所謂明治維新以來，無論海軍軍人，陸軍軍人，從他天皇起直到他的兵士，以及凡受過教育的國民，統統拿「致良知」三個字做他們的民族精神的哲學基礎，所以他能夠尚俠好義，忠君愛國，今天能夠在世界上稱雄，能夠侵略我們中國，壓迫我們中國。⁴⁹

(二) 日本現代化之啟示

為使得國人更充分理解陽明學之價值，蔣中正在竭盡全力地推展新生活運動之餘，更利用不同場合，介紹該學術在日本落地生根而茁壯之歷程。例如，在他所發表的〈中國的立國精神〉演講中就指陳，日本歷史中的「武家」政治，前溯西元 1192 年源賴朝開府於鎌倉，但以「儒術為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以儒術陶冶武士之身心」，所謂「儒教武士道」漸以雛形，猶賴 1603 年德川家康開府於江戶，歷代將軍經年累月的努力。⁵⁰易言之，「武家」

⁴⁹ 蔣中正，〈雪恥救國之道〉（1932年5月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頁529-530。

⁵⁰ 蔣中正，〈中國的立國精神〉（1932年6月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頁598-619。

與「士道」之結合，可謂「武士道」精神之發揚，始於德川幕府的時代，而昌盛於明治維新以後。何以武家當政後，尚需引進中國儒學，蔣中正特引德川幕府首代大將軍德川家康之見解，即「武將雖長於武事，如拙於學，不明聖賢大道，則匹夫之剛而已，武將務必力學，方任可入德之門」。⁵¹

至於德川家康所謂「學」，究指何種學問呢？若用蔣中正的話來闡述，略謂：

德川幕府時代，他們就拿中國程朱與陸王等學說來研究；有些士人是講程朱之學，有些士人是講陸王之學，結果就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有了所得，就是說士道不僅是知，還是要來行。他們得了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學說，做他們的立國精神。⁵²

從另一篇〈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演講中，蔣中正又強調日本之國魂，即為「大和魂」，大和魂所表現的精神，即是「武士道」。「武士道」講究「忠君愛國」、「好俠尚義」、「輕生樂死」。⁵³這些特質都有益於日本建構一個現代國家，當然更有助於建設一個軍事強權。作為塑造日本民族成就這些特質，不外乎德川幕府時期，歷代將軍於中國眾多的儒學宗派中，捨棄程朱理學不用，獨尊陽明學之結果。⁵⁴

合而觀之，蔣中正對日本立國精神之詮釋，可知他對近代日本的觀察，實奠基於他對陽明學之理解。而他對該學說的推崇，除有學術上的鑽研心得以外，日本實際的生活體驗亦扮演重要關鍵。例如，他在回憶留學生涯的演講中曾提及：

當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在渡輪上，凡是在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都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且有很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這個哲學的精義；特別是他海陸軍官，對於陽明哲學，更是手不釋卷的在那裏

⁵¹ 蔣中正，〈中國的立國精神〉，頁618。

⁵² 程朱是指宋朝以來由程灝、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學派。蔣中正，〈中國的立國精神〉，頁602。

⁵³ 蔣中正，〈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1934年7月23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頁362。

⁵⁴ 蔣中正，〈中國的立國精神〉，頁602。

拳拳服膺。後來到書坊去買書，發現關於王陽明哲學一類的書籍很多，有些還是我們國內所見不到的，我於是將陽明哲學有關的各種書籍，盡我所有的財力都買了來，不斷的閱讀研究，到了後來對於這個哲學真是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乃知日本以蕞爾小國，竟能強大至此實得力於陽明「致良知」「即知即行」哲學的結果。⁵⁵

總結蔣中正個人的生活體驗，以及對日本歷史的認識——特別是對日本近代歷史的認識，可得致以下的兩項結論：第一、「武士道」乃是近代日本立國精神。第二、日本武士道既結合中國的「士道」，與日本的「武術」而成。日本武術因援用中國陽明學的精神文明色彩，才使得武士道擁有獨立之思想體系，進而發展成日本立國精神之表率。

「武術」加上「士道」，既然是日本賴以成功之要素，如何將此一成功模式移植中國，自然是蔣中正極欲推展的課題。此一結合，若與傳統中國士人培養過程相比較，迥異之處在於，「武術」養成過程基本上是與個人的體能、體力、身體機能之磨練有密不可分關係，中國宋明理學強調的「格物致知」則是看重「心性修養」⁵⁶等個人內心修練之培養。易言之，「武術」講究的是，對體能之訓練，提倡「由外悟內」，冀望藉由外在行為之反覆練習，體會出武術訓練過程中所孕含之人生真諦。

一般認為，在中國，沒有「武家」這樣的特定階層社群。而自清代中葉起，儒學更有「以禮代理」之呼籲，企盼藉由倫常禮制之實踐，以導正民俗，達到儒家禮治社會之理想，以維持社會秩序等的主張出籠。⁵⁷

中國傳統儒學「由外悟內」的學禮、習禮之論述，在蔣中正倡議之下，與革命話語相結合，藉由國家機制，以動員社會大眾方式，作為引領國民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易言之，新生活運動有兩大特色，一是以全國國民為對象，為舉全國之力所推展的全民改造運動。其動員的方式則採用「以

⁵⁵ 蔣中正，〈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1950年7月30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頁339-340。

⁵⁶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

⁵⁷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頁175。

外悟內」，是藉由群策群力，達到全民共同遵奉之行為模式，用來提升全國國民之道德水準與生活素質。是以，此一運動是有其具體目標，以及明顯的步驟。特別是，要談「以外悟內」，首先需要理解為何外在的生活方式會影響內在的思維？其次要理解外在的生活規範所蘊含的深層意識，特別是藉由反覆的實踐，為何能達到《禮記·大學》所揭示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境界？

對蔣中正而言，中國人毛病在於：

現在我們中國人一般的毛病，就是行動之遲鈍和虛浮，因為行動虛浮，所以一切事情都做得有名無實，因為一切遲鈍，所以看去都是沒有一點精神，各個人以至全社會都是烏煙瘴氣，暮氣沉沉，奄奄一息的樣子，絕對不像一個朝氣勃勃的現代的人，和一個生動向上的現代社會，外國人說我們中國人是「遠東病夫」，笑我們國家是「老大帝國」，就是為此。⁵⁸

故他所冀望的新生活運動，不外乎要求國人：

就是要剷除這一切污穢、浪漫、懶惰、頹唐的鬼生活，來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實在、守時間、守秩序的文明生活！亦即改正過去一切生活的缺點，使全體國民的生活，都能恢復他固有德性「禮義廉恥」的生活。⁵⁹

亦即，要使全國國民凡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無不依照我們中國固有之禮義廉恥道德習慣來做人。簡言之，根據中國固有道德習慣，來決定人人所必須的日常行動。而個人的精神、思想、知識、道德也可藉由日常的生活習慣全面展現。

很顯然地，將日常生活規範與生活品質以及個人道德修養，視為是個人之一體三面，可以相輔相成三個不同面向之認知，應與蔣中正在日本的實際生活體驗有密切之關連。例如，他曾公開勸導國人要以日本為師，並提及其精神教育：

⁵⁸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之真義〉（1934年3月2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頁181。

⁵⁹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之意義和目的〉（1934年3月1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頁139。

我過去在日本學陸軍，受過他們的學校教育，也受過他們軍隊教育，他們雖口裏沒有提出「禮義廉恥」來講，但是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動，其精神所在有形無形之中都合乎禮義廉恥！他們以這樣的教育幾十年教下來，然後才造成今日這樣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建立新的國家，要報仇雪恥，不要講什麼強大的武力，就只看在衣食住行上能不能做到日本人那個樣子。⁶⁰

不過，蔣中正雖對日本人生活方式推推崇不已，又自承自己的陽明學啟發必須追溯日本留學經驗，「去蕪存菁」仍舊是他在中國推展日本陽明學的基本態度。他推崇武士道吸納陽明學之後，能有追求知識以求致善之熱誠。其次，他也欣賞武士道所講究的「篤實踐履」以及「忠君愛國」、「尚俠好義」等肯為國家輕生樂死之實踐精神。至於武士道精神專重「勇」而忽略「仁」重要性的情形，則是他深以為戒之處。⁶¹

例如，蔣中正在談到革命軍人的修身之時，就特別提及：

「仁」性是我們軍人精神的基本，亦是我們中國一切固有道德的一個中心……如果沒有「仁」、一切的精神和道德，就不能整個的連貫起來，完成高尚純潔圓滿無缺的人格與至大至剛的氣節；因為道本惟一，德必求全，一有偏缺，必至走入歧途，得此失彼。他們日本人不知這個道理，亦未認識我們中國全部的固有道德，所以他們的武士道將中國固有道德最中心最基本的一點即「智仁勇」的「仁」字完全丟掉了。⁶²

蔣中正認為，此種欠缺「仁」，只知「勇」之武士道，所造就的日本人，無非就似一顆「過河卒子」，凡事只知「進」而不知「退」。尤其是，19世紀西方勢力東侵，日本在飽受西方帝國主義壓迫以後，日夜所思，無非就是如何自保，以及為了自保必須無止盡地擴大自己的國防保衛圈。

當前的中國，作為被日本侵略的對象，設若企圖在精神層面上找回民

⁶⁰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之要義〉（1934年2月1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頁77。

⁶¹ 黃克武，〈蔣中正與陽明學：以清末調適傳統為背景之分析〉，收入黃自進主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上冊，頁18-19。

⁶² 蔣中正，〈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頁363-364。

族自信，並提出與日本不同蹊徑的救亡之路，本屬事理之常。這亦是蔣中正在提倡新生活運動之際，念念不忘就是要國人遵奉「禮義廉恥」之行為標的。

(三)「知行合一」論的不斷調適

蔣中正綜合個人體驗以及環境的需求，所冀望的新生活運動，不僅是國人個人修養的提升，亦是群體生活素質的整體改善。套用他的話語，中國今日之所需，無非是要以發揮革命史觀為要。至於他所倡導的「知行合一」與孫文的「知難行易」，顯然在針對「認識」與「實踐」的兩個如何組合議題上，⁶³有強調重點不一的差距。關於這方面的評價，蔣顯然是隨著此一議題的關注程度的升高以及現實環境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對應。

例如，戚學民就以蔣中正於 1933 年出版的《革命哲學》為例，說明蔣對於陽明學與孫文思想之間的關連性，在不同階段須有不同的解讀方式。⁶⁴

首先，蔣在其於 1932 年 5 月在以「研究哲學經過及革命哲學」為題的演講中，介紹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所發揮的心理建設功效時，宣稱：

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中國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給日本竊去，拿來壓迫中國，還要來滅亡中國，這是多麼可

⁶³ 方克立，〈重印前言〉，《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

⁶⁴ 《革命哲學》收錄以下6篇演講稿：(1)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1932年5月16日)；(2)革命哲學的重要(1932年5月23日)；(3)怎樣復興中華民族(1933年2月18日)；(4)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所在(1932年5月9日)；(5)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1932年6月6日)；(6)信徒與叛徒之分(1932年5月2日)。戚學民著，都留俊太郎譯，〈蔣介石『革命哲學』における孫文と王陽明の思想の關係性〉，收入日本孫文研究会編，《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ネーションを越えて》（東京：汲古書院，2017），頁138。

恥可痛的事情！⁶⁵

在論述「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何以在異邦大放異彩以後，蔣接著解釋陽明學中的「知」，是指人性的良知，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之知。這與孫文學說中所說科學上知識的「知」，是「本體」上的不同，故陽明學「不但不與總理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而且這兩個學說，是互相闡發，實是相得益彰之效」。

蔣在強調兩人論述，可相輔相成以後，進而指陳「全國的人不能照，總理的哲學『行易』方面去做，祇是向著『知難』方面去求，就是不能『致良知』」。是以，對蔣而言，所謂「『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證明『行易』」。⁶⁶

蔣又認為國人的通病，莫過於：

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所以要受日本人侵略壓迫，主要原因在那裏？就是一般士大夫自己不能做、不敢做、反拿總理的三民主義，總理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弄得一般青年，無所適從。全國的人不能照總理的哲學「行易」方面去做，祇是向著「知難」方面去求，這就是不能「致良知」，亦就是不能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不能成功。我們一般同志，要知道今天黨國弄到這樣地步，就是這一般曲解主義，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弄出來的。我們今天要救黨國，沒有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本著我們自己的良知，照著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⁶⁷

按張朋園的研究，在蔣開始積極倡導他的《革命哲學》的同一時期，亦正逢他決定停辦地方自治，正式放棄訓練民眾行使直接民權的時候。緣 1932 年 8 月，他修改〈剿匪區域內保甲條例〉第四十條，理由是自治在「增進幸福」，保甲在「維持安寧」，兩者性質完全不同，在動亂時期，首重維持

⁶⁵ 蔣中正，〈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1932年5月1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第10卷：演講，頁535。

⁶⁶ 蔣中正，〈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頁537-542。

⁶⁷ 蔣中正，〈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頁538。

秩序，還談不上增進幸福；再者，保甲長是指派即可，是一種自衛組織，自上而下，一聲令下，全體實行；自治中的鄉鎮長是需要經過選舉產生的，由下而上，不易辦理。

爾後，蔣更將前揭原本只針對剿匪地區的法規，進一步適用於全國。同年 12 月，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正式向全國內政會議提案，建議將保甲制度納入地方自治之中。該提案獲得通過。惟此一擱置自治法的推動，顯然違背孫文的遺訓，也與前一年(1931)5 月，國民會議中所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之精神，背道而馳，⁶⁸尤其無視了地方自治將依孫文的「建國大綱」具體落實的相關內容。⁶⁹

然而，誠如蔣在提出修改〈保甲條例〉時所作的陳述：

選舉複決創制罷免四權，陳義誠高，造端誠偉，然決非目前漠視政治，未經訓練之人民所能行使，……一時實無從舉辦，無可諱言。⁷⁰

亦即，蔣為求全面掌控地方行政事務，不得不在高舉「建國大綱」之餘，另闢蹊徑。此等為因應現實環境，而不得再墨守成規之事，亦同樣發生在「知」與「行」的解讀上。易言之，蔣為構建誘導國人走入效忠黨國的動員體制，只得捨「知難行易」說，改倡導「知行合一」論。

當然，蔣既以繼承孫文革命正統自居，勢仍須時常檢驗自我，力求不要脫離孫文軌道過巨為念。例如他於 1934 年 9 月，重讀孫文《孫文學說》時，特於日記中作了以下反思：

前之力行叢書所言者，與總理原意衝突之處甚多，而以王陽明言行合一為總理所反對，而不僅非承其說一點，為最大。其次，為倭寇之強與王學無關，此為總理勸勉國民不得不過甚其辭也。須立說以正之。⁷¹

蔣的反思，反映兩層不同的思維。首先，他開始警覺，在針對「陽明學」

⁶⁸ 張朋園，《從民權到權威：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 136。

⁶⁹ 例如，《訓政時期約法》的第 28 條：「訓政時期之政治綱領及其設施，依照建國大綱之規定」；第 29 條：「地方自治依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之規定推行之」。〈國民會議通過約法〉，《申報》，1931 年 5 月 13 日，3 版。

⁷⁰ 〈清除匪源首須編組保甲清查戶口〉，《中央日報》(南京)，1932 年 8 月 24 日，6 版。

⁷¹ 〈蔣中正日記〉，1934 年 9 月 20 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原件(以下略)。

的評價上，無論是在「知行合一」論，抑或「陽明學是否有助於日本現代化有成」等議題上，自己與孫文的看法頗有差距。復次，對於雙方的差異，蔣卻因不同議題，而有不同的對應。對前者，他認為不可等閒視之，應謀改善；對後者，他認為自己所述才是正論，應更正視聽，讓國人對日本有更好的理解。

1939年4月，蔣為因應《革命哲學》的再版所需，而重新整理他於1932年所講〈研究哲學經過及革命哲學〉的講稿時，對於當年自己的論述，特在日記上留下「思之愧怍莫名」之讀後心得。⁷²

對於蔣、孫兩人的「知行」論本質上的落差，時人不是不察，只是不便公開評論。例如，胡適在他1932年12月的日記中，就提到蔣曾送著作給他，其中以「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比較最扼要。他認為，蔣也知孫的「知難行易」之主旨，在於要人服從領袖，然蔣仍「偏要用陽明來談中山，大概是他不曾明白懂得二說的真正區別在哪兒。」⁷³

按威學民的研究，1939年10月第九戰區所再版的《革命哲學》中，在該演講稿中，與原版本相較，特添增孫文對陽明學的批評。⁷⁴此等論述的

⁷² 此一記載，到後來編纂成《事略稿本》時，則改為「對於王陽明學說與總理學說並論一點，較前少有進步」。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6），頁211；〈蔣中正日記〉，1939年4月22日。

⁷³ 胡適在日記中還有如下的補述：「簡單來說，二說之區別如下：陽明之說是知易行易。中山之說是知難行易。良知是人人所同具，是『你自家的準則，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如真有此物，豈不甚妙？若無此種良知，則『知易』之說不能成立，『知易』不立，則『行亦不易』。然陽明之說先假定有此良知，故可以說，『知行合一』。知善知惡是良知，行善去惡即是致良知。中山之說以『知難』屬於領袖，以『行易』望之眾人，必人人信仰領袖，然後可以『知行合一』。然既謂『行易』，則不必一定信仰領袖了。以吃飯說話等事譬喻『行易』，眾人自然可以自信皆能吃飯說話了！所以必須明了『行亦不易』，然後可以信仰專家」。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6冊：1938-1949，頁187。

⁷⁴ 其原文如下：「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據他們自述，則他們在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這一點儒道的餘緒，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但是這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我們總理是很不贊成的。認為『與真相背馳，而無補於世道人心』。然而日本人竊了去，卻當作他們立國的唯一武器，並且拿來壓迫中國，還要來滅亡中國。我們中國本來有獨到的哲學精神，更有總理根據現實發明後來居上的『行

調整，不僅代表蔣自 1939 年以來，對脫離孫學軌道以來的長期反思，亦代表他對孫、王兩位學術論述位階的重新排列。蓋在 1932 年，當蔣決定在孫文遺訓以外，另闢蹊徑時，係將孫、王兩位的論述並列。及至 1939 年，蔣決定仍回到以孫學為主軸，陽明學降到輔助的角色。對於此一轉變，戚學民的詮釋頗有見地，他認為這與國民黨的全面「尊孫」政策有密切的互動關係，是 1940 年 4 月被國民政府尊奉孫文為「國父」政策的一環。⁷⁵至於此一調整，是否可視為蔣在思想脈絡中有新的轉折，則可從以下蔣在遷臺以後的論述中，得到答案。

四、實踐哲學的時代意義

(一) 革命的再起

學習陽明學，似乎成為蔣中正終其一生，不曾怠惰之議題。尤其每當他遭遇挑戰，急思擺脫困境時，陽明學永遠是激勵他奮起的心靈泉源。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於北京宣布建立中共政權，蔣中正眾多應急措施中，最值得特書之處，莫過於 10 月 16 日於臺北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企圖藉由對國民黨籍的軍政高級幹部再教育，能盡掃黨內諛敗推過之頹廢風氣，為創國民黨再起，引進新的奮戰標的。

蔣中正正在為該院舉辦的開幕儀式中，以院名相關的 3 個名詞之意義作為引言，介紹他召集大家入學受訓之目的。首先，他談「革命」，強調「革命必先革心」，冀望學員要將「一切自私自利的心理，貪污腐化的行為，軍閥官僚的作風，徹底革除，徹底洗刷」。其次，他提及「實踐」，要求學員今後要有「力行實踐的精神，來糾正我們過去虛偽浮誇的惡習，要以篤行

易知難』的革命哲學，我們不讓真實奉行，反讓日本得以撫捨了中國哲學片段，倒轉來欺凌我們中國，這是多麼可恥可痛的事情」。轉引自戚學民著，都留俊太郎譯，〈蔣介石『革命哲学』における孫文と王陽明の思想の關係性〉，頁 131-132。

⁷⁵ 戚學民著，都留俊太郎譯，〈蔣介石『革命哲学』における孫文と王陽明の思想の關係性〉，頁 131-136。

貫徹的事實，來洗刷我們過去徒有宣言口號而沒有實際行動的恥辱」。最後，他談到「研究」，希望利用一個月受訓時間，「養成大家研究的風氣，來樹立我們今後革命和建國的新作風、新精神」。⁷⁶

蔣中正強調革命之使命與實踐研究之精神，藉以糾正大陸時代之流入虛偽空談，不知研究進取之弊端，⁷⁷可謂上揭開幕詞之重點。然究其實質，其談話之主軸，仍冀望部屬能養成陽明學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之精神。

蔣中正對「革命實踐研究院」之重視，除身兼院長以外，更親自授課，直接向院生傳授自己的革命哲學以及人生閱歷，其中不乏對陽明學之闡述、日本經驗，以及對於日本殖民臺灣之評價。例如，他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後的翌月，於該院主持「總統紀念週」時，首先以金門及登步島大捷為引言，稱許 2 次戰役之重大意義，在於將登陸上岸的敵軍徹底殲滅，不使有一人漏網；⁷⁸今後更望院生能保持戰果，凡事「實事求是」。其次。話鋒一轉，提及他到臺灣後之體驗：

我到臺灣以後，看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在這裏的許多建設，心裏有無窮的感觸。……阿里山入山鐵道由山底升到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巔，其計畫的遠大，工程的艱鉅，以當時臺灣的情形，實在足以驚歎！看了這種偉大的工程，那我們川陝之間的棧道，西南各省的索橋，簡直是渺小得不足道了。但他這兩個工程都不是一年兩年所能成功的。而是定了一個計畫之後，由小而大，自卑而高，經過十年二十年繼續不斷的努力，纔能得到今天這樣的結果。……他們這種計畫真可以就是百年大計，而他們這種孜孜不輟，踐履篤實的精神，也纔是真正的建國精神。⁷⁹

⁷⁶ 蔣中正，〈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1949年10月1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頁27-32。

⁷⁷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第4編：保衛臺灣與建設臺灣，頁108。

⁷⁸ 1949年10月25日，中共軍隊約萬人在金門西北角古寧頭登陸，至27日為國軍擊敗。是年11月4日，中共軍隊約5,000人在舟山外圍登步島登陸，繼又增援2,000兵力，至6日為國軍所敗。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頁557。

⁷⁹ 蔣中正，〈陸海空軍聯合演習要旨〉（1949年11月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中正公開讚揚日本於臺灣殖民建設之成就，自然期盼援用此等實例，更說服部屬用此新角度去思索日本精神之可貴。除此之外，仍期許今後中日關係，能援用新思維重新思考，好為他即將重用的「白團」預留空間。

1949年9月「白團」於東京成立，由原中國戰場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⁸⁰擔任召集人所成立一個軍事顧問團，主要工作則是幫助國民政府重整軍隊紀律。他們工作範圍包括軍事教學、術課指導，以及各種典範規令之製作，東京總部由岡村寧次負責，駐臺北的負責人是原二十三軍總謀長富田直亮，富田在臺灣化名白鴻亮，「白團」的名字就是由富田的中國化名而來。⁸¹

軍官訓練團成立期間只有短短2年，⁸²但已培訓了中、小階級軍官10期，結業人數達4,059員，高級將官3期，結業人數達657員。對國軍士氣的重整、戰技的提升有莫大的貢獻。尤其「白團」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上徹底失利，外交上全面孤立，身處存亡之秋的狀態下，來到了臺灣。值此情勢，「白團」成為蔣中正重整旗鼓，鞏固軍心之秘密武器。蔣中正不僅借重「白團」之示範教學，藉以提升國軍之戰鬥技能，增強國軍之軍事素養；更寄望仰仗「白團」成員之身教，因而軍中掀起一股全面向日本學習、看齊之熱潮。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頁72-73。

⁸⁰ 岡村寧次，陸軍大將，1933年曾任關東軍副參謀長，代表關東軍參與塘沽協定交涉。1938年出任第十一軍司令官，參加武漢會戰。1944年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指揮打通大陸作戰。戰後以戰犯罪被起訴，但被判無罪。返日後成立白團，整合日本舊軍人，全力支持轉進臺灣的中華民國重整軍備。

⁸¹ 中村祐悅，《白團：台灣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將校たち》（東京：芙蓉書房出版，1995），頁14-21。

⁸² 「白團」總共在臺灣工作了20年，時間是從1949年的年底到1969年的年初，初期的工作是負責軍官訓練團的教學、教導團的軍事訓練，以及統籌三軍聯合演習。中期以後，因美援的到來以及美軍顧問團的進駐，白團的工作轉為幕後，改組成「軍學研究會」，以「實踐學社」為其代稱，負責參謀作業教學。該社選調三軍軍官，施以高級兵學訓練，先後開設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兵學研究班、科學軍官儲訓班、高級兵學研究班、戰術教育研究班、動員幹部訓練班等，並由日籍教官授課於國防部人事訓練班、史政人員講習班，以及各軍事院校。此外，日籍教官協助籌設1954年成立的國防部計畫局，對戰爭指導及國家總動員等的研究，提供頗多寶貴意見。1952年，白鴻亮還曾督率日籍教官40餘人，為陸軍第三十二師施行日式訓練，重點在「攻擊」、「機動」、「奇襲」。相關計畫的實施，成效卓著。黃慶秋，《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在華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8），頁31-39。

1950年6月11日，蔣中正於圓山軍官訓練團發表〈實踐與組織〉的演講時，再次呼籲學員們「不但要接受日本教官學術上的指導，尤其要學習他們的精神及其組織能力」。⁸³所謂「他們的精神」就是指武士道，就是指重實踐的生活哲學。根據蔣的觀測，日本精神的特色在於「凡是他們自己認為必須追求的道德、知識和文化，第一步苦心孤詣以求其了解，第二步篤實踐履以促其實現，這就是王陽明所謂『即知即行』，毫不因循遲疑，敷衍懈怠。」⁸⁴

蔣中正指稱，日本原本也是：

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根本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和我國在清末民初的國際地位一樣。……日本所以由弱而強，是得力於「知行合一」的力行精神及其堅強組織；而其所以由盛而衰，則因為中心失所，國策錯誤。⁸⁵

換言之，蔣中正認為日本之失敗，在於錯誤國策，領導不得其人，日本人所奉行不渝之實踐哲學，仍是個人求上進國家求發展之不二法門。

同年6月27日，蔣在主持圓山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時，再度呼籲學員們要向日本教官看齊。他認為從日本教官的身教中，可以歸納出日本國民有負責、服從、服務、犧牲、創造、守法等六大精神特質。日本的立國精神，所謂「武士道」精神，就是這六大精神的組合。⁸⁶

在這篇題為〈軍官訓練團畢業學員的任務〉的演講中，他再度闡揚日本的立國精神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以及與日本由弱轉強的互動關係。蔣在介紹明治維新之際，除再次談到陽明哲學對明治維新的貢獻，也開始介紹明末大儒朱舜水⁸⁷對明治維新的影響。他認為，朱氏之學以「存誠居敬

⁸³ 蔣中正，〈實踐與組織〉（1950年6月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頁272-273。

⁸⁴ 蔣中正，〈實踐與組織〉，頁273。

⁸⁵ 蔣中正，〈實踐與組織〉，頁273、275。

⁸⁶ 蔣中正，〈軍官訓練團畢業學員的任務〉（1950年6月2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頁312-313。

⁸⁷ 朱舜水，名之瑜，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博學通經術，崇禎年間屢徵不仕。明亡後，心懷故國，力圖恢復，嘗乞師日本，日人禮之而師不果出；復奔走安南、暹羅等地，亦無所成，乃仿魯仲連義不帝秦之例，永住日本講學。1658年德川光國迎為

躬行實踐為主，與王學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宗旨相同」；朱氏以國師之身份，在日本任教 16 年，當時受教的學者，「挈取朱氏學說的基本精神輾轉施教，於是日本社會普遍感受其學說的薰陶，因而養成一種篤實踐履的風氣，蔚成日本當時一種強有力的新文化運動，實為明治維新的先驅」。⁸⁸

蔣中正反覆要學員們學習日本精神，足證他認為日本之實踐哲學的確有可取之處。他反覆闡揚日本武士道的特質之際，也不忘強調武士道與中國儒家源起一宗之血緣關係。而蔣以前只提王陽明，如今又提朱舜水，既顯示他對日本武士道精神掌握深度正不斷提升，也反映他對國人接受武士道精神之深切期盼。

(二) 面對「知難行易」說之質疑

然而，蔣中正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據點，要求黨內軍政大員各位皆以研讀陽明學為要時，面臨了部屬將上揭孫文的「知難行易」學說，與蔣中正在「實踐與組織」的講稿中所闡述的「知行合一」學說中的衝突，整理出「讀訓質疑」，⁸⁹請求蔣解惑。

有關出自部屬的困擾，源於《孫文學說》第五章「知行總論」篇中，孫文對陽明學的批評：

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

國師，興起水戶學風，並修《大日本史》。1682年卒，年83。

⁸⁸ 蔣中正，〈軍官訓練團畢業學員的任務〉，頁314。

⁸⁹ 表達困惑者的是羅友倫中將，當時剛從美國就醫回國，擔任國防部高級參謀，奉命赴「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旁聽，在研讀蔣在該團的講稿後，於1950年7月下旬提出質疑。朱淞源、張瑞德訪問，蔡說麗、潘光哲紀錄，《羅友倫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00-103。

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咸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⁹⁰

為了徹底顛覆國人對「知」與「行」孰易孰難之既有爭辯，孫文不僅對「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傳統論述持有否定意見，連陽明學說中「知行合一」之學說亦在否定之列。除此之外，孫文對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實有賴於

⁹⁰ 孫文，〈行易知難·第五章·知行總論〉，頁382-383。

陽明學說法，依然並不贊同。在他的認知中，日本成功應歸類為兩大因素，一是全面西化，二是武士精神猶存。

所謂武士精神，自然是指武士道。孫文並不認為，武士能被形塑成為強而有力之武裝集團，是因得力於陽明學派的學術滋養。在他的論述中，武士本為日本封建社會之產物，習以戰鬥為業，故勇於挑戰，富冒險犯難之精神。基於這樣的精神，各藩武士在面對 19 世紀中葉西方帝國主義東侵日本時，不滿德川幕府與列強簽訂之片面開國協定，毅然掀起「尊皇攘夷」的義旗，以謀抵制西方勢力入侵。而及至他們與英、法、荷、美等國有實際交戰經驗，⁹¹得知敵我勢力懸殊，一味抵制西方即有亡國危機之後，又瞬間當機立斷轉向支持改革開放，為明治政府全面西化政策奠定新基。

是以，孫文相信，武士乃封建時代的遺物—彼等之勇敢果斷乃因職業上訓練所致，與陽明學毫無關聯。明治維新之改革開放，端賴武士集團「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之果斷決定。至於日本現代化有成，無非是全面學習西方。基於這樣的日本近代史觀，孫文主張中國需要西化、需要科學救國。⁹²

面對部屬的質疑，蔣中正於一星期後，以公開演講方式作了如下的答覆：首先，蔣認為，「知」與「行」出自兩個相對概念時，側重實踐，講究如何落實；這同樣是孫文、王陽明兩人堅持之所在，故兩人在「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⁹³其次，蔣認為雙方學說之出入，在於對「知」的涵義不同。王陽明所謂知，是指人性的良知，「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之知」，例如愛國家、愛民族、惡惡習、好好色。而此種基於道德本能而具有的判斷，是不待外求。是以，陽明學的「致良知」，無非是期許眾人皆不應為人世各種繁雜現象所困，只要靜下來聆聽自己良心的呼喚，皆可尋出真理所在。既然良知是「生而俱有，生而知之」，故只要肯擺除世俗的雜欲，人人

⁹¹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國交戰，1864年英、法、荷、美等四國曾組聯合艦隊進攻長州藩。

⁹² 例如孫中山在談民族主義時，就提及「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國父全集》第1冊，頁37。

⁹³ 蔣中正，〈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頁342。

皆可掌握真理，人人皆可成聖，可謂是陽明學的真諦。

蔣中正還指出，孫文所指「知」，意謂科學上的知識之「知」，此等知識的獲取與累聚，皆得仰仗「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非經長期鑽研而不得輕取之學識。由於不是每個人皆有此等智慧或此等機緣可以附會，此等「知」無法奢望眾人皆可獲取，因而重要的是眾人懂得聽取先知先覺者的指示。此外，由於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講究分工合作，若以造屋為例，由工程師負責製圖設計，確定房屋面積大小，及各種材料尺寸，爾後其餘事務則交由工匠執行。基於各司其職的原則，參與者藉由不同的合作案例，更能熟能生巧、精益求精。此等分工愈細，進步空間愈大的現象，更是現代社會大家所共有的經驗。反之，若凡事硬要強求「知行合一」，工程師如親自動手蓋房，則結果只會造成事倍功半，人類退化到上古時代。上揭情形，乃是孫文運用分工合作之概念，批評「知行合一」之說不符合現代社會人的生活方式之重點。⁹⁴

蔣中正的最後結論是，兩者所論述之「知」，可說是同字異義；因之，兩人理論論述範疇不一，故沒有相互矛盾，可並行不悖。倒是，蔣縱然沒有否定孫文之論述，也不在意孫文對王陽明的批評，抑且更加推崇陽明學。從此觀之，蔣的態度蘊含兩層不同的意義。首先，蔣內心認為，要拯救國人疏於實踐的慣性，自己的改革方案更能因應時勢。復次，以當時黨內外政治情勢而言，蔣已獲致無人可取代的權威地位，無庸再多靠「尊孫」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對自己在陽明學上與孫持有不同見解之事，自覺已無忌的必要。

(三)對日本陽明學的再肯定

誠如前文所述，蔣於 1932 年初開始倡導陽明學時，並沒有注意到孫文反對「知行合一」論一事。然到 1934 年，他重讀《孫文學說》後，才驚覺雙方的隔閡。而其補救之道，只是利用 1939 年重新再版他的《革命哲學》演講稿論集時，除保留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如何備受陽明學啟發的論述

⁹⁴ 蔣中正，〈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頁 343-345。

外，追加了孫對陽明學的批評，並指出孫的學說「後來居上」，較陽明學更符合中國現狀，更能幫助中國擺脫困境。

易言之，終始 1930 年代，蔣並沒有正式處理孫、王在「知行」論上的異同。而至 1950 年，退守臺灣並趁部屬提出質疑之際，蔣才有一完整的論述。「殊路同歸」，是蔣對兩人學說所持的基本評價。蔣強調，孫、王兩人所倡學說之最終目的，皆是為求國人早日養成劍及履及的落實習慣，故在求「行」的目的論上，雙方沒有差異。復次，在「知」的解讀上，孫王兩人是有同字異義之別。前者的「知」，是來自於科學理論；後者的「知」，是來自於天賦。至於，孫對王學的批判，則是緣自於「分工合作」已是現代社會人的生活方式，王學論述只能反映上古社會的生活體驗。

相較於 1930 年代蔣對孫王兩人的評述，可發現蔣在 1950 年代不只延續自己的既有見解，也有新的見解。前者是指蔣於 1932 年開始倡導陽明學時，即有指出，兩人對「知」的意涵不一；後者則強調，孫對王學的批評，是立足於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兩者對「行」的訴求上，皆秉持同一方向。

關於世人對於孫學說的質疑，以及孫、王兩人學說方向不一的負面評述，前文中已有所介紹。惟若將焦點放在對孫學說持肯定者，則可發現 1940 年代西南聯大教授賀麟的相關評論，更是瞭解蔣「知行」論精髓的最重要線索。

賀麟早年留學美國及德國，以研究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及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哲學思想而聞名於世，且於 1940 年代開始倡導新心學，強調中西文化融通，被視為新儒家的代表學者之一。對於他而言，孫、王的學說之間，不僅沒有隔閡，甚至認為「(蔣所倡)行的哲學，乃是於王陽明的哲學及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灼然見到其貫通契合處，加以融合發揮而來」。⁹⁵

按黃克武的研究，蔣對賀的注意，始於 1940 年底，雙方第一次見面則

⁹⁵ 賀認為蔣強調「所謂思維言論，祇是行的過程」是與王主張「博學審問慎思辨明皆是行」的看法是一致的。此外，蔣提倡「致知難行易之良知」，主旨就是要國人尊奉孫的「知難行易」說，以三民主義為良知內容，以致良知為實行三民主義的方法，要勿畏難勿忽易，亦即勉為其難力行其易。賀麟，《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頁 61-65。

是在 1941 年 1 月。在蔣的日記中，曾於同年的 1 月 15 日及 2 月 11 日，分別有以下的記載：前者是「正午與賀麟談哲學」；後者是「與賀麟談《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彼頗有見地」、「下午會客，校閱賀麟著《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⁹⁶

蔣賀的交流、蔣賀兩人對孫王知行論的評語幾近雷同，顯示蔣對孫、王學說的最終評論應是得自賀論的啟發。例如，「知行合一」論不符合現代人的生活模式，及孫、王兩人在倡導「行」的命題上是殊路同歸等等論述，皆是賀麟早在 1940 年代就曾著書介紹過的想法。⁹⁷

賀麟的論述有助於理解孫、王學說在追求「行」的命題上殊路同歸、並行不悖。不過，此等理解仍不能解釋蔣為何非要棄孫的學說不用，仍要堅守王學不可的緣由。箇中關鍵，只得從孫、王兩人在解讀「行」意涵中的差異，王學在日本的發展以及蔣的日本生活經驗等議題上尋找。

蓋孫、王兩人所論述的「知」，既然已有同字異義之別，對於「行」的訴求，兩人期許的層次自然有所不同。對孫來說，他的「知」是唯有「先知先覺」才可具備的「智慧」，一般民眾是無緣體會；故而，民眾對「行」所扮演的義務僅在於謹守本份，徹底服從領導教誨。與此相較，王的「知」，是指「良知」，是與生俱來的天賦，是不假外求的「智慧」；民眾在行動之前，還需先要有掌握初心的過程。後者是王在強調「知行合一」的同時，亦不忘倡導「致良知」的緣由。

換言之，孫將「知」與「行」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因而在「行」的層面上，要求一般民眾必須篤實勵行領導的命令。可是，王認為「知」與「行」乃一體的兩面，「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⁹⁸知惟有透過行才能成為真知，而行又得藉由具體的實踐行為才能昇華到掌握知的精隨。是以，

⁹⁶ 轉引自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臺北，2010.3），頁24-31。

⁹⁷ 賀麟認為孫的「知難行易」論述中，其核心理念為「能知必能行」，這與王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論述，可互為表裏，更可發揮知必能與行合一的精神。再則，孫倡導「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的說法，可以補強王原本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意涵，使之可提升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新境界。賀麟，《當代中國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5），頁123。

⁹⁸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第5條，頁33。

王對行的要求，較孫繁雜，不僅加重行為者對追求「知」有道德責任外，也要求行為者在追求良知的過程中，亦需在行為中要有精益求精，止於至善的奮鬥精神。

蔣對王「知行論」的青睞，不僅是王的論述較孫的主張更具主動學習精神，更重要的是，王的論述已在日本取得成功經驗。王在其《傳習錄》中所強調的「事上磨練」功夫，被日本武士奉為圭臬。⁹⁹亦即，王將日常生活的內外事情皆視為是一種磨練，講究「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¹⁰⁰的修行方式，是武士能將劍術提升到「以心御身」的不二法門。¹⁰¹

對於陽明學在日本的發展，蔣較孫有更深的體認。或許是基於這樣的因素，蔣面對「讀訓質疑」中孫文聲稱日本明治維新與陽明學毫無關聯的論述時，不願表示認同。不惟如是，蔣對陽明學的推崇，在往後的歲月中尤歷歷可見。例如 1967 年 11 月 12 日，他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評議會上，發表了〈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演講，就可視為他無意改變自己日本史觀的最佳註腳。該演講中，他首先介紹 1880 年代伊藤博文對中國的看法，其次他又談到 1930 年代英國學者陶納(R. H. Tawney)來華觀測後觀感，最後他歸納出我國知識階級和教育界有以下的病根：第一、專務空言。為的是好高，也為的是塞責。第二、因循苟且。一時受刺激，似乎奮發有為，但待其事稍定，則又因循敷衍，又睡覺矣。第三、保守落伍。一切墨守成規，不知向前推進。第四、牽制掣肘。伊藤博文說的：「至云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何以不必慮呢？因為中國「稍為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第五、打圈旋磨，陶納譏刺，「中國人會議了又會議，起草了計劃以後，還得起草計劃，報告以後還是報告」，¹⁰²做任何

⁹⁹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頁285-299。

¹⁰⁰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第23條，頁62。

¹⁰¹ 張崑將，《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442-446。

¹⁰² 蔣中正，〈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上)〉（1967年11月12

一件事，不肯毅然決然負起責任，而做也很難期其徹底。

在蔣中正指出中國知識份子的通病之後，希望國民黨黨政要員今後要知恥、知病、求行、求新，接續他言及 19 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國民黨成敗榮辱之關鍵問題。

蔣非常具體的介紹，中日兩國在面對 19 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東侵之歷史過程中，引發兩國不同反應的過程。首先他談到鴉片戰爭、《北京條約》、中越戰爭等中國一連串對外戰爭之失利，以及自強運動、維新變法等中國面對困局時所做出調整。其次，他談到日本之《安政條約》，被逼放棄鎖國政策之屈辱過程，面臨對外來勢力挑戰時「開國派」和「攘夷派」對國策方向的辯論，以及明治維新的成就。

蔣敘述中日兩國在「閉關鎖國的時間相同，西方文化衝擊的程度和感受相同，維新變法的要求亦復相同」後，緊接著又分析兩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何以日本能成功而中國卻失敗之前因後果。

第一、兩國發展之基礎不一。按蔣中正的話，「日本民族整體純一」。日本是單一民族，沒有民族畛域，使得國內政治環境比較單純，改革共識比較容易培養。至於中國，當時滿漢的民族界限十分嚴格，滿人認漢人為「非我族類」之奴隸，排擠之、嫉忌之、奴視之，無所不至，以致「李鴻章主張擴大辦理洋務，立即被指目為漢奸；郭嵩燾提倡步武歐西富強之道，就說他『有二心於英國』」。主張革新派的漢人大臣，時刻被牽制，無法全力以赴，乃中國變法事業無成的原因之一。

第二、兩國維新變法的層次不一。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個有通盤計劃之改革運動。對內以立憲、舉才、建軍、廢階級、興實業、辦學校為重點；對外則派遣留學生，學習實用科學，整個吸收工業生產技術，且與列強通聘修好，相互通商，減少外來壓力。復以交涉為手段，以民心為後盾，故 30 年之內，解除與美、意、英、俄等 10 餘國之不平等條約，走向自由平等之獨立國家。反過來看，當時中國方面，所倡導的維新格致之道，卻無一而非因陋就簡，看來是改革，實際則是半新半舊，不新不舊之皮毛改革，根本沒有通盤計劃，亦無既定目標；不但沒有科學的知識，也缺乏政治、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9卷：演講，頁76-80。

經濟、教育、軍事與外交要和時代配合同時進步的常識。例如，曾國藩和李鴻章作為當時新政中心人物，但是「文正(曾國藩)所定天下大計，僅及於政，而不計及教；文忠(李鴻章)步趨文正，更不知有所謂教者」。¹⁰³ 改革政治若不以改革教育為根本，足證其不存有現代知識。此所以日本維新則日強，中國變法則日削，依舊落後如故，變亂如故之原因。

第三、兩國之獨立自主精神不一。日本的維新，雖然事事以歐洲為師，但是日本始終堅持自立求新之精神，基本上不依賴外援。但是清廷則毫無獨立自主的精神和意識。學習外國的技術，就丟棄了自己傳統的優點；接受外國的觀點，就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而且事事都想依賴外人。兩國的自主意識不一，自然也影響到兩國現代化的成就。

蔣中正論析兩國於現代化改革歷程，歸諸於推動現代化之基礎、視野以及自主的精神之不一，而有顯著不同的結果之後，接著強調日本現代化之有成，在於「他們能夠知恥知病，求行求新，並致力於科學與工業發展，真能實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的結果」，而同時日本另一可貴之處在於「雖銳意改革，努力求新，卻還能始終堅守其根本，不失其民族的本性」。最後，蔣將日本成功之經驗，歸納為「求行、求新、求本」，並呼籲國民黨的從政要員，以這三項目標做為國家求自立求自強的起步。¹⁰⁴

蔣從早年的伊藤博文與李鴻章的現代化認知之比較，更增添入曾國藩，並思考兩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環境及政府行政體制架構差異性，無非彰顯他對中日兩國比較論更有所見地。同時，他欲強調陽明學的可貴，兼具超越時代及國界的價值。

綜合上述，可知蔣對陽明學的推崇，與他對日本明治維新史的理解，有互為表裏的因果關係。尤值注意的是，蔣隨著生涯對日本現代化的愈趨肯定，加深了他對陽明學的推崇，將日本現代化的有成，歸功於日人吸取陽明學精髓。至於他的日本史觀之建立，有其個人在學術上的長期耕耘，亦有其長期在日本生活之體驗。

例如，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創刊號上，有一則「記東京留學生歡

¹⁰³ 蔣中正，〈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上)〉，頁82-89。

¹⁰⁴ 蔣中正，〈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上)〉，頁90-99。

迎孫君逸仙事」的報導，其中記載日人末永節在歡迎會有如下發言：「諸君自表面而觀，謂敝國今日之強，由於取西法之效，而不知為漢學之功。當年尊王傾慕之士，皆陽明學絕深之人，而於西法未必盡知。使無此百折不回之諸前輩，以傾倒幕府立定國是，則日本之存亡，未可知其能有今日之盛耶。故諸君亦惟先發揮其國學，丕定國基，再以西學輔之，則敝國之富強不難致。駕而過之亦不可知，否則先期所後，後其所先。摹仿敝國今日之皮毛，而遺本國固有之精髓，必無效可見」。¹⁰⁵

末永節的論述，不僅代表他個人的日本史觀，亦反映他對中國革命抱持樂觀態度的根源。雖然其與孫頗有私誼，¹⁰⁶但很顯然的，他的明治史觀並沒有被孫接受，反而被蔣全面接收。於是，相較孫認為日本近代化的動力是全面西化，蔣卻將日本經驗視為是一部陽明學在日本落實的縮影，並主張恢復中國固有道德，認為改革首務在於充實國人政治哲學的涵養。¹⁰⁷

五、結論

孫文揭櫫的「知難行易」論，旨在宣揚三民主義在中國落實的可行性；其成功的前提在於，民眾要懂得遵從先知，服從領導，積極推展中國國民黨為中國所設計的建國藍圖為要。蓋此一論述提出的時期，孫文已擱置「議會政治」路線，轉而主張「直接民權」，強調「訓政」體制以及開始闡揚「以黨領政」。上揭現像，誠為表裏之關係。

無論如何，前述新論述的出現，以及中國國民黨之創建等政治發展，很顯然地為中國革命帶來新的氣象。尤其是「知難行易」論的推展，為孫文打造出前所未有的領導權威；「訓政」體制必要性的再強調，亦為國民黨

¹⁰⁵ 過庭，〈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民報》，第1號(東京，1905.10)，頁74。

¹⁰⁶ 按孫中山年譜，可知他曾參與籌劃發動惠州軍事，雙方於1900年7月起，就有密切來往。羅家倫，黃季陸主編；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4)上冊，頁168。

¹⁰⁷ 例如蔣介石在指陳中國教育忽視哲學訓練之流弊時，就強調「哲學對於人生，不僅能使個人有振衰起敝的功效，而且可以改造整個民族與整個社會，以發揮無與倫比的偉大力量」。蔣介石，〈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1941年7月9日-10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8卷：演講，頁270。

的「以黨領政」論述提供新的理論基礎。這些國民黨路線、體制的新調整，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影響，莫過於為日後引進「以黨建國」、「民主集中制」等蘇聯模式，營造出共存的空間。職是之故，在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中，「知難行易」論的確發揮其階段性任務。

另一方面，就國民黨發展的長期趨勢觀之，蔣中正高舉的「知行合一」論，尤有一段成形與推廣過程。從國民黨史觀脈絡下，蔣中正雖被列為孫門三大弟子，然與胡漢民、汪精衛兩位師兄相較，其與孫文的私淑關係最淺；特別是，孫文早年不長於文墨，革命宣傳多由胡漢民、汪精衛兩人代筆，¹⁰⁸這使得胡、汪兩人頗有直接參與建構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的經驗，而蔣中正並未與焉。

蔣中正在孫門中能夠後來居上，首要因素自然是領軍北伐，建立了統一關內的不世武功。但即令如此，蔣不忘強調忠誠，終身以孫文信徒自居，以落實孫文遺訓自許，亦是其成功要訣。是以，蔣針對陽明學，默認其與孫文有不同評價的差異，可謂是平生中罕見的事例。究其關鍵，還是在於兩人對如何動員民眾有不同的認知，以及兩人面對了不同的時空背景。對孫文而言，他需要的是激起民眾對個人的崇拜；而對蔣中正而言，他需要的是民眾對組織的服從。而由於雙方的差距，產生了個人條件與角色的不一。孫文是理論家，有與生俱來的群眾魅力。再者，以現實環境而言，屈居在野的他，惟有依賴理論，多方仰仗宣傳，才有爭取民眾注目的機會。惟對已是執政者的蔣中正而言，只要民眾能夠奉命行事，就可充分發揮動員之功能。況且，蔣不是一個具備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的領導者，不似孫文能自我建構一套政治理論、鼓舞民眾信奉。故對他來說，與其強調信仰先知，不如強調忠實履行組織命令；強調信仰個人，也不如強調服從黨國體制。

是以，1932年蔣中正決定在「知難行易」論以外，另闢蹊徑，改提「知行合一」，無非是認為先知已逝，新的黨國體制亟需新的心理建設之論述。正如在同年，他擱置地方自治，改採「保甲制度」時所的考量，其認定孫

¹⁰⁸ 張朋園，《從民權到權威：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98。

文的遺訓誠有時窮之處，為更有效應付時局所需，不得不因時因地而改弦更張之必要。

同時，孫文、蔣中正兩人對「知」與「行」的認知不一，與兩人對陽明學的評價不一，以及兩人的日本近代史觀，亦有所關連。孫文認為日本現代化能有成，首重在於他們全面西化政策，其次得力於長年武家政治之薰陶，武士勇於接受挑戰、富冒險犯難精神。因此，他對明治維新之成功有賴於陽明學的說法，持否定態度。與孫相較，蔣中正卻將日本經驗視為是一部陽明學在日本落實的縮影，認為日本是得力於吸取陽明學的「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精神，故勇於接受新思想並付諸實踐工夫。此亦是明治時代決定改革開放之後，日本就能立即西化，且迅速改革有成之緣由。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史料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Chiang Kai-shek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6卷：民國二十一年八月至九月，臺北：國史館，2004。

Wang, Zhenghua bian zhu.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di 16 juan: min guo er shi yi nian ba yue zhi jiu yu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4.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5卷：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至七月，臺北：國史館，2004。

Wu, Shufeng bian zhu.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di 15 juan: min guo er shi yi nian liu yue zhi qi yu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1938-194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Hu, Shi zhe, Cao, Boyan zheng li. *Hu Shi ri ji quan bian*, di 6 ce: 1938-1949, Hefei: Anhui jiao yu chu ban she, 2001.

孫文，〈宣言及文告·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1921年1月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Xuan yan ji wen gao, lin shi da zong tong jiu zhi xuan yan," (1921 nian 1 yue 1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2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規章·中華革命黨總章〉，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9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Gui zhang, zhong hua ge ming dang zong zhang,"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9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1921年3月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3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Yan jiang, san min zhu yi zhi ju ti ban fa," (1921 nian 3 yue 6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3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論著·中國革命史〉，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Lun zhe, zhong guo ge ming sh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2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三民主義》，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San min zhu y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1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民權初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Min quan chu bu*,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1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革命方略》，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Ge ming fang lue*,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1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孫文學說》，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Sun wen xue shuo*,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1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孫文，《實業計畫》，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1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Sun, Wen. *Shi ye ji hua*,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guo f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Guo fu quan ji*, di 1 ce, Taipei: jin dai zhong guo chu ban she, 1989.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6。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ren wen zhong xin bian. *Min guo er shi ba nian zhi Jiang Jieshi xian sheng*, Taipei: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ren wen zhong xin, 2016.

過庭，〈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民報》，第1號(東京，1905.10)，頁

68-76。

Quo, Ting. “Ji dong jing liu xue sheng huan ying Sun jun Yixian shi,” *Min bao*, di 1 hao (Tōkyō, 1905.10), 68-76.

蔣中正，〈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上)〉(1967年11月12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9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Shi jiu shi ji yi lai ya zhou de xing shi he wo men fu guo jian guo de yao dao (shang),” (1967 nian 11 yue 12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29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中國的立國精神〉(1932年6月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Zhong guo de li guo jing shen,” (1932 nian 6 yue 6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0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1932年5月1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Zi shu yan jiu ge ming zhe xue jing guo de jie duan,” (1932 nian 5 yue 16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0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軍官訓練團畢業學員的任務〉(1950年6月2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Jun guan xun lian tuan bi ye xue yuan de ren wu,” (1950 nian 6 yue 27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23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1934年7月23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Ge ming jun ren de zhe xue ti yao,” (1934 nian 7 yue 23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2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1949年10月1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Ge ming, shi jian, yan jiu san ge ming ci de yi yi he wo men ge ming shi bai de yuan yin,” (1949 nian 10 yue 16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23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留學生之責任與基本修養〉(1934年3月2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Liu xue sheng zhi ze ren yu ji ben xiu yang,” (1934 nian 3 yue 2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2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陸海空軍聯合演習要旨〉(1949年11月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Lu hai kong jun lian he yan xi yao zhi,” (1949 nian 11 yue 7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23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雪恥救國之道〉(1932年5月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Xue chi jiu guo zhi dao,” (1932 nian 5 yue 9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0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之要義〉(1934年2月1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Xin sheng huo yun dong zhi yao yi,” (1934 nian 2 yue 19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2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之真義〉(1934年3月2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Xin sheng huo yun dong zhi zhen yi," (1934 nian 3 yue 26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2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1934年3月1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Xin sheng huo yun dong de yi yi he mu di," (1934 nian 3 yue 19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2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發凡〉(1934年2月1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Xin sheng huo yun dong fa fan," (1934 nian 2 yue 17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12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實踐與組織〉(1950年6月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Shi jian yu zu zhi," (1950 nian 6 yue 11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23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蔣中正，〈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1950年7月30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Jiang, Zhongzheng. "Zong li 'zhi nan xing yi' xue shuo yu Yangming 'zhi xing he yi' zhe xue zhi zong he yan jiu," (1950 nian 7 yue 30 ri) shou ru Qin Xiaoyi zhe bian. *Xian zong tong jiang gong si xiang yan lun zong ji*, di 23 juan: yan jiang,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4.

羅家倫、黃季陸主編，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4。

Luo, Jialun, Huang, Jilu zhu bian, Qin, Xiaoyi, Li, Yunhan zeng ding. *Guo fu nian pu*, shang ce, Taipei: guo min dang dang shi hui chu ban, 1994.

(二)專書

中村祐悅，《白団：台湾軍をつくった日本軍将校たち》，東京：芙蓉書房出版，1995。

Yūetsu, Nakamura. *Paidan: Taiwangun o tsukutta nihongun shōkōtachi*, Tōkyō: Fuyō Shobō Shuppan, 2006.

方克立，《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Fang, Keli. *Zhong guo zhe xue shi shang de zhi xing g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6.

朱宏源、張瑞德訪問，蔡說麗、潘光哲紀錄，《羅友倫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Zhu, Hongyuan, Zhang, Ruide fang wen, Cai, Shouli, Pan, Guangzhe ji lu. *Luo Youlun xian sheng fang wen ji lu*,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4.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臺北：國史館，2014。

Lu, Fangshang zhu bian. *Jiang Zhongzheng xian sheng nian pu zhang bian*, di 4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14.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民國初年的奮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Li, Yunhan. *Zhong guo guo min dang shi shu*, di 2 bian: min guo chu nian de fen dou,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94.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3編：訓政建設與安內攘外，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Li, Yunhan. *Zhong guo guo min dang shi shu*, di 3 bian: xun zheng jian she yu an nei rang wai,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94.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4編：保衛臺灣與建設臺灣，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Li, Yunhan. *Zhong guo guo min dang shi shu*, di 4 bian: bao wei tai wan yu jian she

- tai wan,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94.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2009，2版。
- Zhang, Yufa. *Zhong hua min guo shi gao (xiu ding ban)*,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2009, er ban.
- 張朋園，《從民權到權威：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 Zhang, Pengyuan. *Cong min quan dao quan wei: Sun Zhongshan de xun zheng si xiang yu zhuan she jian lun dang ren ji zhi shu sh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2015.
-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Zhang, Shouan. *Yi li dai li: Ling Tingkan yu qing zhong ye ru xue si xiang zhi zhuan bian*,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4.
-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
- Zhang, Kunjiang. *Dechuan Riben "zhong" "xiao" gai nian de xing cheng yu fa zhan: yi bing xue yu Yangming xue wei zhong xin*, Taipei: xi ma la ya ji jin hui, 2003.
- 張崑將，《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 Zhang, Kunjiang. *Dian guang ying li zhan chun feng: wu shi dao fen liu yu shen tou de xin quan shi*, Taipei: tai da chu ban zhong xin, 2016.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 Guo, Tingyi. *Jin dai zhong guo shi gang, xia ce*, Taipei: xiao yuan chu ban she, 1994.
- 賀麟，《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重慶：青年書店，1943。
- He, Lin. *Zhi nan xing yi shuo yu zhi xing he yi shuo*, Zhongqing: qing nian shu dian, 1943.
-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5。
- He, Lin. *Dang dai zhong guo zhe xue*, Shanghai: sheng li chu ban gong si, 1945.
-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 Chen, Yongjie. *Wang Yangming chuan xi lu xiang zhu ji ping*, Taipei: tai wan xue sheng shu ju, 1983.
- 陳儀深，《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Chen, Yishen. *Zhongshan xian sheng de min zhu li lun*, Taipei: tai 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85.
- 黃道炫、陳鐵健，《蔣中正：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 Huang, Daoxuan, Chen, TieJian. *Jiang Zhongzheng: yi ge li xing zhe de si xiang zi yuan*, Taiyuan: shan xi ren min chu ban she, 2012.
- 黃慶秋，《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在華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8。
- Huang, Qingqiu. *Riben jun shi gu wen (jiao guan) zai hua gong zuo ji yao*, Taipei: guo fang bu shi zheng ju, 1968.
- 鈴江言一，《孫文傳》，東京：岩波書店，1968。
- Suzue, Gen'ichi. *Son Bun den*, Tōkyō: Iwanami Shoten, 1968.
- 橫山宏章，《素顔の孫文：国父になった大ぼら吹き》，東京：岩波書店，2014。
- Yokoyama, Hiroaki. *Sugao no Son Bun: kokufu ni natta ooborafuki*, Tōkyō: Iwanami Shoten, 2014.

(三)論文

- 胡漢民，〈孫文學說的寫稿經過與其內容〉，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編，《胡漢民先生文集》第2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頁448-454。
- Hu, Hanmin. "Sun Wen xue shuo de xie gao jing guo yu qi nei rong," shou ru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bian. *Hu Hanmin xian sheng wen ji*, di 2 ce, Taipei: zhong yang wen wu gong ying she, 1978, 448-454.
- 胡適，〈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亦知難說」述評〉，《吳淞月刊》，第2卷第4號(上海，1927.06)，頁1-10。
- Hu, Shi. "Zhi nan, xing yi bu yi: Sun Zhongshan xian sheng de 'xing yi zhi nan shuo' shu ping, *Wu song yue kan*, di 2 juan di 4 hao (Shang hai, 1927.06), 1-10.
- 戚學民著，都留俊太郎譯，〈蔣介石『革命哲学』における孫文と王陽明の思想の關係性〉，收入日本孫文研究会編，《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ネイションを越えて》，東京：汲古書院，2017，頁122-141。
- Qi, Xuemin zhe, Tzuru, Shuntaro yi. "Shō Kaiseki kakumei tetsugaku ni okeru Son bun to Ō Yōmei no shisō no kankeisei," Shou ru Nihon Son Bun kenkyūkai bian. *Son Bun to ajia taiheiyō: Neishon o koete*, Tōkyō: Kyūkoshoin, 2017, 122-141.
- 黃克武，〈蔣中正與陽明學：以清末調適傳統為背景之分析〉，收入黃自進主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上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1-26。

- Huang, Kewu. "Jiang Zhongzheng yu Yangming xue: yi qing mo diao shi chuan tong wei bei jing zhi fen xi," shou ru Huang Tzuchin zhu bian. *Jiang Zhongzheng yu jin dai zhong ri guan xi*, shang ce, Taipei: dao xiang chu ban she, 2006, 1-26.
- 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臺北，2010.3)，頁17-58。
- Huang, Kewu. "Jiang Jieshi yu He Li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67 qi (Taipei, 2010.3), 17-58.
- 黃克武，〈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國史館館刊》，第34期(臺北，2012.12)，頁45-68。
- Huang, Kewu. "Xiu shen yu zhi guo: Jiang Jieshi de sheng ke sheng huo," *Guo shi guan guan kan*, di 34 qi (Taipei, 2012.12), 45-68.
- 黃道炫，〈蔣介石與朱、王二學〉，《史學月刊》，2012年第12期(開封，2012.12)，頁37-42。
- Huang, Daoxuan. "Jiang Jieshi yu zhu wang er xue," *Shi xue yue kan*, 2012 nian di 12 qi (Kaifeng, 2012.12), 37-42.
- 秦英君，〈蔣介石「力行哲學」思想論〉，《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開封，1990.08)，頁16-22。
- Qing, Yingjun. "Jiang Jieshi 'li hang zhe xue' si xiang lun," *Henan da xue xue bao(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1990 nian di 4 qi (Kaifeng, 1990.08), 16-22.
- 楊天石，〈宋明道學與蔣介石早年的個人修養：讀蔣介石未刊日記〉，收入楊天石著，張曉敏、施宣圓編，《楊天石文集》第2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284-302。
- Yang, Tianshi. "Song ming dao xue yu Jiang Jieshi zao nian de ge ren xiu yang: du Jiang Jieshi wei kan ri ji," shou ru Yang Tianshi zhe, Zhang Xiaomin, Shi Xuanyuan bian. *Yang Tianshi wen ji*, di 2 ce, Shanghai: shang hai ci shu chu ban she, 2005, 284-302.
- 劉維開，〈國民政府的備戰〉，收入許瑞浩、蕭李居編，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和戰抉擇》，臺北：國史館，2015，頁215-304。
- Liu, Weikai. "Guo min zheng fu de bei zhan," shou ru Xu Ruihao, Xiao Liju bian, Lu Fangshang zhu bian. *Zhong guo kang ri zhan zheng shi xin bian: he zhan jue ze*, Taipei: guo shi guan, 2015, 215-304.

(四)報紙

〈國民會議通過約法〉，《申報》，1931年5月13日，3版。

“Guo min hui yi tong guo yue fa,” *Shen bao*, 1931.5.13, 3 ban.

〈清除匪源首須編組保甲清查戶口〉，《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8月24日，6版。

“Qing chu fei yuan shou xu bian zu bao jia qing cha hu kou,” *Zhong yang ri bao* (*Nan jing*), 1932.8.24, 6 ba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Knowing” and “Act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Sun Yat-sen and Chiang Kai-shek

Huang, Tzu-chi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n 1918, Sun Yat-sen propagated his theory of “knowing is difficult, but acting is easy” in order to promote hi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in China. The premise of this theory was that people should follow the political visionaries, obey their leaders, an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as designed by the Kuomintang. During the same period, Sun Yat-sen had shelved reforms towards a system of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yihui zhengzhi*) in favor of advocating popular sovereignty (*zhijie minquan*). He also emphasize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agating political tutelage (*xunzheng*) and promoting a single-party system.

In 1932, Chiang Kai-shek decided to replace the theory of “knowing is difficult, but acting is easy” with Wang Yangming’s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zhixing heyi*). He considered that after Sun-Yat-sen’s death people were in urgent need of a new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party-state system. For Chiang, carrying out orders faithfull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loyal to one’s ideological mentors and furthermore, complying with the party-state system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faithful to individu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n and Chiang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knowing” and “acting”, their different evaluation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and their divergent views o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were all interrelated. For Sun Yat-sen, Japan’s modernization was successful due to a comprehensive policy of westernization and Japan’s long-established spirit of *bushido*. For this reason, he disagreed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had relied o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In contrast, Chiang Kai-shek stressed that Japan’s absorption of the spirit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as expressed in concepts such as “attaining pure knowing” (*zhi liang zhi*) and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during the late Tokugawa era had allowed it to enthusiastically engage in practice besides accepting new ideas. To him, that was why Japan could immediately westernize and reform successfully in the Meiji era.

Keywords: Sun Yat-sen, Chiang Kai-shek,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Knowing is difficult, but acting is easy”,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